

名妓、文人與晚清上海的娛樂文化

——評葉凱蒂《上海·愛——名妓、知識份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

● 胡悅晗

《上海·愛》一書細緻地展現出晚清上海文人士大夫在彷徨和矛盾的心態下蛻變為城市知識份子，而昔日以嬌弱之態出現的名妓華麗轉身為「城市明星」，以至民國以降傳統青樓文化全面解體這一劇變的細微過程，並分析箇中原因。



葉凱蒂 (Catherine Yeh) 著，楊可譯：《上海·愛——名妓、知識份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北京：三聯書店，2012)。

妓女和妓院象徵着一個城市的奢靡與繁華。明清時期江南城市繁榮的工商業與富庶的市井生活催生

了娼妓業的興盛不衰。無法通過科考步入仕途的失意文人入城謀生，在聲色犬馬的城市生活中運用自身的文化資本，通過與妓女的交際活動，不但造就了「名妓」的出現，更開創出雅致的「情色文化」，進而塑造出一個婚姻生活之外的「情感世界」^①。

鴉片戰爭以來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導致了傳統文人士大夫群體內部的「雅文化」在開埠口岸上海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幾十年後，文人士大夫在彷徨和矛盾的心態下蛻變為城市知識份子，而昔日以嬌弱之態出現的名妓華麗轉身為「城市明星」。民國以降，傳統青樓文化全面解體，終至壽終正寢，成為明日黃花。這一顛覆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美國波士頓大學現代語言與比較文學系教授葉凱蒂 (Catherine Yeh) 集二十年心血，寫成《上海·愛——名妓、知識份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以下簡稱《上海·愛》，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細緻地展現出這一劇變的細微過程，並分析箇中原因。

葉凱蒂注意到，「中國的城市史研究中，娛樂業還沒有得到相應的承認」。而在她看來，「上海城市形象的關鍵正是娛樂業，是它讓各路金融鉅子、往來客商慕名而來」(〈導言〉，頁6-7)。上海的娛樂文化與名妓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晚清一大批倡優小說將上海和妓女聯繫在一起。上海妓女小說的誕生，可以說是城市小說的開始。圍繞着城市娛樂生活或經濟人文生活，城市小說中第一次出現了各色城市人物，包括上海妓女，這是中國近代文學中的第一批現代都市的人物形象^②。

在研究路徑上，儘管在觀點與思路上受到賀蕭(Gail Hershatter)與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關於上海娼妓研究的影響，但《上海·愛》仍然強調該項研究與已有研究相區別之處。賀蕭「主要是從權力與控制的視角」考察娼妓作為性工作者受到社會壓迫的問題，而葉凱蒂的研究思路直接受到王德威關於晚清小說孕育出獨特的現代性這一結論的影響。該書致力於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歷來各種文本在表現十九世紀晚期，尤其是十九世紀晚期的上海時，上海名妓的形象無所不在(〈導言〉，頁11)？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運用闡釋學的文化史研究法，不拘泥於史實本身，而是通過對王韜、鄒弢、李伯元、陸士諤等晚清文人發表的作品進行文本細讀，發掘文獻展示的

意義世界；在研究資料上，作者綜合運用了大量明信片、地圖、人口統計資料、繡像小說、廣告、報刊、回憶錄等各種類型的文獻資料。全書不以時間為序，而是按照幾個相互平行的線索布置框架。全書七個章節大致分為三個主題：第一，上海名妓的生活世界及其對城市文化的影響；第二，上海文人名妓之間的關係；第三，現代出版業對名妓與娛樂文化的形塑功能。筆者擬按照上述三個主題對該書展開述評。

一 名妓與上海城市文化

無論是晚清的《遊戲報》、《圖畫日報》、《點石齋畫報》等小報，還是《海上繁華夢》等小說中，都有大量關於妓女與城市空間的描寫。從1860年代至二十世紀初，上海名妓一直成為社會的焦點。她們的身份、性格和生活方式成為公眾輿論的熱點話題。

近代中國文學作品中，上海的種種現代性特徵，主要通過空間的剪裁與場景的戲劇化得以體現。晚清以來在關於上海各類文本——小說、散文、電影以及歷史表述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經久不衰的空間意識，且與上海本身的殖民地城市性質密切相關，主要體現為對於空間分割、差異空間的對立與並存，以及跨越邊界的強烈體驗^③。有別於傳統名妓多出現在鄉間書房或是恩客私宅等私密空間裏，晚清上海名妓頻繁出入城市的公共空間，並通過將西方物質文明納入生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運用闡釋學的文化史研究法，不拘泥於史實本身，而是通過對王韜、鄒弢、李伯元、陸士諤等晚清文人發表的作品進行文本細讀，發掘文獻展示的意義世界。



晚清時期上海的名妓乘坐馬車招搖過市已經成為城市一景

上海名妓頻繁出入城市的公共空間，並通過將西方物質文明納入生活世界而成為時尚的引領者與傳播者。她們出沒於南京路上的各色商店，在賽馬場和戲園爭搶風頭、標新立異。

活世界而成為時尚的引領者與傳播者。她們住在福州路附近的娛樂區，老城廂和租界店鋪售賣的西式籐藝沙發、香水、羽毛扇和珠花頭飾進入了她們的閨房。如果說傳統家具傳遞的是距離、秩序和一種廣義的宗族結構，那麼新的家具則以摩登和舒適訴說着一種親密(頁53)。坐馬車、吃大菜、上劇院，是她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她們出沒於南京路上的各色商店，在賽馬場和戲園爭搶風頭、標新立異。時人慨歎，「上海地方婦女之蹀躞街頭者不知凡幾，途間或遇相識之人，歡然道故，寒暄笑語，視為固然。……此風日甚一日，莫能禁止。」④

儘管名妓顛覆傳統等級秩序與社會界限的行為常常招致時人的譏諷，但她們身處邊緣地位，沒有束

縛，我行我素，體驗着越界的快感，只在對自己生意有利時才堅持傳統。她們打破了老城廂妓院裏的傳統規矩，用新式社交禮儀和一系列經過利益衡量後選擇的交易行為塑造出租界妓院的新規則。一流名妓苦心經營自己的儀式資本，以便與客人的經濟資本相抗衡。新式娛樂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於這種建構出來的平等性。名妓作為積極的主體，希望人們把她們的服務看成職業的娛樂接待(頁126)。

《紅樓夢》不僅對清末小說創作有重大影響，與滬上青樓亦有密切聯繫。滬上青樓妓女閱讀並演繹《紅樓夢》，將紅樓人名冠於己身。在滬上盛行的花榜中，或以紅樓眾美比附青樓女子，或援紅樓「薄命司」冊簿之例，品評風月⑤。「大觀

園」象徵的詩情畫意與眾生平等成為滬上文人与名妓共用的文化遺產。名妓選擇扮演小說中的角色，既把自己置身於熟悉的高雅文化之中，又獲得幾分叛逆和新潮的自由（頁143）。她們精心設計居住的房間，用各種珍奇的裝飾品營造一種合適的氛圍，將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隔離開來。吳儂軟語是她們的職業語言。她們在以相當文學知識與詩歌技巧為基礎的高雅遊戲中打發時間，展示她們的機敏和文采。客人則統統扮演賈寶玉，在模仿賈寶玉與他的女性親友遊戲的過程中營造着妓女與嫖客之間的情感生意。擁有西式建築、寬闊街道與琳琅店鋪的上海物質世界，成為名妓的遊戲空間。在各種小報的渲染下，上海正逐漸變成一個每天上演着情愛劇的世界遊戲場。

二 從「共情」到「共謀」： 名妓與滬上文人

文人與妓女之間相知相惜的傳統經久不衰。遠離家鄉趕考的貧寒士子客居都城或省城，他們的大量空閒時間與家財都消耗在城市的青樓之中。與妓女的往來成為他們日後追憶歌詠的主題之一。明代科考屢頻，地方上累積的生員群體日益龐大，他們無法通過科考之路步入仕途，從而不得不在富庶繁華的城市另謀生計。他們深感懷才不遇，遂流連妓院，將內心的憤懣、悵然情緒全然投入在聲色犬馬生活之中，以寄情聲色消解仕途之失意。「情感世界」成為「科考生涯」之外的

精神寄託。文人與妓女之間共同譜寫着一曲「共情」的樂章。

儘管晚清上海的文人同樣止步於科考之路，但他們在城市的人生軌迹與前輩文人截然不同。開埠以來，他們為上海雨後春筍般的機會與勃勃生機吸引，在報社、出版社、譯書館等租界新媒體和各種機構中上班，領取薪水。西方的時間觀念改變了他們日常生活的節奏，他們必須在特定的時間內完成工作。他們不再擔當傳統社區的道德領袖，而只是魔都上海的匆匆過客。客居的身份增加了他們對上海的疏離感，也消弭了他們扮演道德領袖的角色焦慮。由於他們已經脫離了傳統文人的身份，現在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在從事新式職業的同時保有一些傳統文人的生活方式。

當文人在工作之餘出入妓院、結交妓女時，他們發現世事亟變使這個群體變得面目全非。上海的名妓不僅生意興隆，還逐漸變成了職業藝人和女商人。她們不再符合從前的文化形象，在她們的世界裏也沒有晚明的懷舊之情（頁188）。她們熟練地周旋在商賈、名流等眾多恩客之間，而非拜倒在文人的詩詞之下。她們的轉變令晚清滬上文人無所適從。在名妓面前喪失傳統文化資本與社會地位，令文人心神不安。隨着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矛盾的加劇，女性逐漸成了傳統男性焦慮與恐懼的主要對象^⑥。

然而，晚清滬上文人在覺察到名妓變化之快的時候，也發現這個群體所蘊含的市場價值——她們成為城市矚目的焦點，代表着城市公

上海名妓不僅生意興隆，還逐漸變成了職業藝人和女商人。她們熟練地周旋在商賈、名流等眾多恩客之間，而非拜倒在文人的詩詞之下。她們的轉變令晚清滬上文人無所適從。

近代上海的出版業通過對名妓形象的塑造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利潤。名妓不再是與傳統花園、閨閣相聯繫的「佳人」，而是被放置在上海都市空間的環境下加以渲染，成為「都市麗人」。

共形象。初到上海的外地人急於了解這個城市的新與奇；讀者則希望獵奇，卻又不想冒風險。為了滿足大眾的閱讀需求，撰寫《花界指南》、《竹枝詞》與各種冶遊小說，報導名妓的生活世界乃至花邊新聞，給從事娛樂出版業的文人帶來利潤（頁188-90）。文人用推銷形象的方式與他們過去所愛慕、保護的名妓聯繫在一起。他們與名妓的關係逐漸從互相憐惜的「共情」發展為互惠互利的「共謀」。他們報導、書寫名妓的過程也是他們尋求自身身份的過程。從王韜的《淞隱漫錄》和余懷的《板橋雜記》等小說中可以看出，1850到1880年代租界在貿易、文化生產等方面引領全國，給文人提供了自信與令人尊敬的社會身份。他們不再與其他士紳階層相比較，而開始把自己看作新興的城市知識階層。他們把這種心態的變化寫入了自己的作品裏（頁195）。

三 「麗人」、「悍婦」與「城市明星」：名妓與現代出版業

近代上海的出版業通過對名妓形象的塑造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利潤。名妓不再是與傳統花園、閨閣相聯繫的「佳人」，而是被放置在上海都市空間的環境下加以渲染，成為「都市麗人」。這一轉變消解了傳統雅文化中的獨佔性。文人把名妓送入了市場，但同時也失去了從前獨佔她們的優勢（頁218）。名妓開始成為公眾的觀賞對象。流行於十九世紀末的狎邪小說以寫實主義手法

披露風月場所的黑暗面。名妓開始以生性狡詐、拼命壓榨客人錢財的「悍婦」形象出現（頁222）。

1890年代末期，當中國的改良精英用變法和主辦有政治傾向的報紙企圖挽救清政府的衰敗時，上海娛樂業的富庶繁華催生了一種新的印刷品——娛樂小報。這些娛樂小報通過把妓女推向市場舞台形成了自己的動力機制。在這個機制中，文人退居幕後，不再作為昔日妓女的情人知己，而只能用筆杆子寫寫故事；而伴隨着名妓「四大金剛」（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和張書玉）在全國的聲名鵲起，上海創造了名妓文化，名妓成為全國矚目的「城市明星」。名妓與媒體的互動使上海的娛樂市場得到全面開發，而上海的報館文人只能將他們失意的情緒抒發在小說裏。

從社會邊緣逐漸走到舞台中心的名妓愈來愈多地介入城市公共生活。她們自由出行，在賽馬場、四馬路等娛樂空間拋頭露面，開始進行各種公開演出。名妓的生意目標群體日益擴大，娛樂報紙配合市場消費需要，滿足了公眾茶餘飯後對名妓生活的好奇心與窺私欲，使得人人都可以通過某種消費對名妓引導的城市娛樂生活進行有限的「介入」，即葉凱蒂所稱的一種新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娛樂的「民主化」（頁356）。過去恩客才有接近名妓的特權，現在報紙做了一個諷刺性的文化倒置，把曾經屬於文人的特權帶進了整個市場，恩客與名妓之間交際恩寵的高雅文化被放在眾目睽睽之下，當成新式娛樂來推銷（頁252）。

早期關於妓女的文學作品淡化了城市的角色。而在晚清小說中，描寫名妓與城市的比重日益增大，城市被賦予奇幻的色彩，而名妓則被描述為眼中只有生意、權力欲和自我滿足的一個群體。關於上海的地圖、旅遊指南等各種出版物中蘊含着政治、民族與文化的意涵。葉凱蒂在另外一個研究中發現，在不同的上海地圖中，反映出的是租界作為通商港口取勝於上海縣城的過程，但這並不是一場種族的競爭，中西雙方的主要分歧是政治與思想意識方面的^⑦。葉凱蒂也在《上海·愛》中指出，中外不同機構刊印的《上海指南》手冊對上海娛樂業與名妓的表述體現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價值、商業實踐與市民意識。葛元煦《滬遊雜記》中的上海是沒有過去的上海；吳友如《申江勝景圖》中的上海是一個多族裔共存的社區；傳教士達爾溫特 (Charles E. Darwent) 的《上海旅遊手冊》(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強調開埠以來上海在市政與公共建設等方面的改善及經由租界孕育出的公共精神 (頁316-37)。這些指南背後的各異觀念催生了一個獨特的、強大的上海身份認同，並孕育出現代上海市民文化。

四 結論與商榷

在《上海·愛》末尾，葉凱蒂認為，娛樂業扮演了社會變遷與現代化的發動機角色。上海租界為娛樂

業和娛樂文化提供了獨特條件，名妓也紛紛前來，利用租界特有的環境尋找機會。小報的繁榮促使出版市場與娛樂業、名妓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最終誕生了一種新型都市文化。在這種文化下，文人失去了以往的諸多特權，成為報館、書局職業工作者，而昔日依附於他們的名妓則登上城市公共舞台大放光彩，成為中國走向繁榮與現代化的標誌。

葉凱蒂1950年出生於北京一個南洋華僑家庭。父母時為外國來華專家，在中央部委與北京大學任職^⑧。1970年代，葉凱蒂赴美唸書，幾經周折，入讀哈佛大學研究院，並獲得博士學位。葉凱蒂在唸博士期間以《孽海花》為例研究晚清中國政治小說，在研究中注意到晚清娛樂文化在社會變遷中起到的作用，進而將研究領域拓展至晚清上海的娛樂文化史與城市史。她在文學領域的多年積累使得《上海·愛》一書運用了大量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以及近年來興起的視覺文化研究方法，該書的結論也大大豐富了近代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的意涵。

然而，《上海·愛》一書仍不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作者對於名妓主體性與上海獨特性的過份強調，引起了研究者的質疑。正如台灣學者連玲玲指出：如果在十九世紀末晚清名妓仍然以娛樂文化創造者的姿態出現於公眾眼前，何以風雅的青樓文化會在二十世紀迅速墮落^⑨？美國學者戴沙迪 (Alexander Des Forges) 在書評中指出，此書陷入上海獨特論的陷阱，誇大了上海與中國其他地方的不同^⑩。

上海租界為娛樂業和娛樂文化提供了獨特條件，名妓也紛紛前來，利用租界特有的環境尋找機會。小報的繁榮促使出版市場與娛樂業、名妓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最終誕生了一種新型都市文化。

在近代上海出版與傳媒業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在形塑這個城市的面貌。葉凱蒂注意到了地圖與各種指南手冊中對上海的不同表述和形塑，但對於出版傳媒業對上海獨特性的肆意渲染則有所忽略。

筆者以為，產生上述質疑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該書將名妓作為考察對象。儘管有關倡優業的興替自古以來不入正史，但作為該行業精英群體的名妓，憑藉自身的相貌姿色及其與有地位、有身份的恩客形成的關係網絡等條件，在娼妓行業內具有相當的自主權及參與制訂遊戲規則的資本和能力。這使得葉凱蒂筆下的名妓以一種強勢面貌呈現。這種強勢面貌一方面與晚清上海開埠以來的社會變遷相結合，為晚清名妓掙脫妓院的束縛，走向契約型交易市場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則剝奪了中下層妓女的生存空間，形成娼妓群體內部的潛在壓迫。

開埠以來，西洋物件等各種「奇技淫巧」引入上海，由此形成都市時尚生活的「各領風騷」與推陳出新。名妓具有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能夠使其更好地適應乃至引領都市新潮流，而中下層妓女則明顯缺乏此種應對條件，由此導致其生存日艱。古已有之的娼妓群體的内部壓迫與近代新潮相結合，在壓迫的方式、群體內部的分化等方面均與古代社會迥然不同，值得深入探究。事實上，賀蕭筆下的娼妓與葉凱蒂筆下的名妓均具有主體性，只不過前者時時在陋巷與工部局巡捕、華界警察鬥智鬥勇，在棚戶區與幫口工人討價還價；而後者則在敞亮、雅致的私宅中與商人、社會名流調情，在賽馬場一擲千金。

而在近代上海出版與傳媒業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在形塑這個城市的面貌。葉凱蒂注意到了地圖與各種指南手冊中對上海的不同表述和形塑，但對於出版傳媒業對上海獨特性的肆意渲染則有所忽略。這一

點，也許如戴沙迪所言，探尋上海發達的媒體工業在誇張地表現上海獨特性方面的作用更為重要^①。

註釋

①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未刊稿，頁245-92。

② 葉凱蒂：〈妓女與城市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2期，頁24。

③ 陳曉蘭：〈原始與現代：上海的雙重面貌——20世紀早期中西作家對上海的不同想像〉，《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1期，頁105。

④ 〈二人摸乳被枷〉，《申報》，1872年6月4日。

⑤ 岳立松：〈《紅樓夢》與晚清滬上青樓〉，《紅樓夢學刊》，2009年第2輯，頁79。

⑥ 孫紹誼：《想像的城市——文學、電影和視覺上海（1927-193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222。

⑦ 葉凱蒂：〈從十九世紀上海地圖看對城市未來定義的爭奪戰〉，載劉東編：《中國學術》，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118。

⑧ 陳菁霞：〈葉凱蒂：一個移民者的學術之路〉，《中華讀書報》，2010年8月4日。

⑨ 連玲玲：〈情愛上海：名妓、文人與娛樂文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07年第15期，頁272-73。

⑩⑪ Alexander Des Forges,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 by Catherine Ye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 no. 4 (2007): 1138.

胡悅晗 杭州師範大學城市學研究所
講師